

恶人：普通人为何变成恶魔（一部文学性与学术性兼具的加害者访谈录 荣获国际人权图书奖 理想国出品）

作者：[美]詹姆斯·道斯

EVIL MEN

by James Dawes

Copyright © 2013 by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译文由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授权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9-2020-944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恶人：普通人为何变成恶魔/（美）詹姆斯·道斯 著；梁永安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0.10

ISBN 978-7-5426-7216-2

I. ①恶... II. ①詹... ②梁... III. ①人性—研究 IV. ①C9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185626号

恶人：普通人为何变成恶魔

[美] 詹姆斯·道斯 著 梁永安 译

责任编辑/徐建新

特约编辑/张璇硕

装帧设计/高 熹

内文制作/李丹华

责任校对/张大伟

责任印制/姚 军

出版发行/

(200030) 上海市漕溪北路331号A座6楼

邮购电话/021-22895540

印 刷/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2020年10月第1版

印 次/2020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 本/635mm×960mm 1/16

字 数/209千字

印 张/17

书 号/ISBN 978-7-5426-7216-2/C·605

定 价/52.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0539-2925659

[目录](#)
[序言](#)
[恶人](#)
[致谢](#)
[注释](#)

献给我的家人

中学的历史老师教导我们说“历史”是“生命的老师”（magistra vitae）。但当历史伴随着它残酷的光辉向我们倒下时，就在我家乡城市上空无比真实的火焰之下，我明白了，她是一位奇怪的老师。她给那些有意让她幸存下来的人、那些追随着她的人更多的材料去思考，比所有古老的编年史擦起来还要高。而这些密密麻麻的昏暗材料，它们需要许多人的良知一并运作，才能被解释和阐明。

——齐别根纽·赫伯特（Zbigniew Herbert）

序言

本书要谈的是凶残（atrocities）：它长什么样子，它给人什么样的感觉，它缘何产生，怎样做或许可以阻止它。整件事情起于我和摄影师亚当·纳德到日本采访一群侵华战争的战犯。他们年老衰弱，很多都年过八旬，年轻时曾犯下最令人发指的恶行，最终全被俘虏，在战犯营里关了十年。他们给我看战争岁月时的照片：褪色的黑白照片里，年轻人们穿着军服，表情或自豪或害怕，或凶狠或稚嫩。看着年轻时的自己，他们告诉我自己看见的是虚空，是恶魔。

我参与人权工作多年，但之前从未访谈过加害者。事前我完全没料到这些访谈会让我晕头转向，更让我大吃一惊的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自己竟然开始透过他们的眼睛看世界。本书的风格和结构都是为了和你们分享这种奇特经验而设计的。这本书不只讲述了这些战争罪犯做过什么，还讲述了跟他们成为朋友是什么感觉。

在这篇序言里，我提出了一组问题，关于这些已发生的恶行对当今的人们来说意味着什么，而更重要的或许是：它们仍在不断发生。这些问题同时也是本书的概念地图。本书接下来的行文方式模仿了摄影师手中细心探究的镜头的视觉语言：先是大致定格在某个画面；然后慢慢推进到一组视觉细节上；再缩小画面以更全面地重新审视其所处的环境，此时细节虽然被扩大的焦点隐没，却仍然鲜明，如同凝视太阳太久在视网膜留下的印迹；之后再一次调整焦距并对准另外一个关切位置。

在推进这组问题时，我会强调它们内在的一些悖论。诗人约翰·济慈（John Keats）在一个不同的语境中讨论过“自我否定力”（negative capability）^[*]这个概念：那是一种在面对不确定、神秘和疑惑时仍能保持敞开，并抵抗一种诱惑：把一切简化为熟悉的术语和范畴这些可以掌控的东西。“自我否定力”允许我们体验悖论——以及它在文体领域的表亲并置（juxtaposition）^[†]——并将其视为一种开启问题、有时甚至是意义的方式，而这些无法经由语言表达出来。

1. 从一开始：书写或阅读一本这样的书存在哪些道德和伦理上的风险？我们如何才能抱着尊重和关怀，而非哗众取宠的好奇心来观看这些具有强烈侵略性和创伤性的事件？要怎样做才能让极度私人的创伤见容于毫无怜悯之心的公共空间？这些问题的答案中心是一个最重要的结构化悖论：精神创伤的悖论。我们在道义上有责任去再现（represent）精神创伤，但我们同样有责任不这样做。

2. 如果我们打算一同经历这些骇人的故事，我们可以用它们来做什么？这些故事能帮我们回答以下这类问题吗：社会是怎样把正常人变成怪物的？进一步来说：个体的心路历程是什么样的？逐渐成为怪物的感觉体验（felt experience）是什么样的？更进一步来说：鉴于这些怪物往往是男人，性别在种族清洗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再一次，这些问题的答案都环绕着关键悖论旋转，包括“邪恶的悖论”（邪恶既是恶魔和他者，又是平庸和寻常的）和“责任的悖论”（我们是自由和具备自主能力的，同时又是环境的产物）。

3. 拉回镜头：我们所目睹的这些骇人的苦难会怎样影响我们对于存在于世的整体想象、我们的“大局”信念——对人类未来所寄予的希望；影响我们最后的乐观主义或悲观主义；影响我们对利他主义、超越（transcendence）甚至是“神”（the divine）^[‡]的看法？其中包括了一些我们熟悉的悖论：“利他主义的悖论”（利他主义要求我们为他人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但帮助他人也能满足我们自己的利益）、“虚无主义的悖论”（为了找到自己存在的意义，我们必须面对自己的无意义性），以及基督教版特有的“恶的悖论”^[§]（全能和全善的上帝如何能准许恶行的存在？）

4. 经历过这样的残忍——不仅震撼我们的良知，甚至动摇我们对世界的看法的残忍——宽恕是可能的吗？个人或国家在犯下滔天大罪之后还能指望得到宽恕吗？既然人的记忆力总是不牢靠、自我保护和自利的，而历史本身充满谎言，加害者要如何才能做到忠实自白？事实上，在战争、酷刑和自白之间，真相的位置又在哪里呢？思考这一系列互相关联的问题会驱使我们不断回到“自白的悖论”：自白是人们所需要的具备疗愈性的文化形式，但又具有潜在的破坏性。

5. 最后，让我们以开始的地方作结。诸如此类的自白都是一些故事，有其自成一格的伦理。然而更普遍

的讲故事的伦理又是什么呢？对我来说，这里牵涉的正是于我个人而言最为困难的悖论：书写的悖论。要书写别人的隐私生活，你必须和别人建立互相尊重而亲密的关系；然而，要书写别人的隐私生活，你又必须冷漠无情地对待他们，如同小说中的人物一般予以建构、摆布和展示。很多人会从事书写或阅读创伤故事这种艰难的工作，是因为相信这样做可以提升人类的尊严。讲故事不只是倡导人权时最基本的工作，并且是人类同理心最基本的运作方式。但我们讲述的故事真的能改变什么吗？如果可以，带来的又是哪一类的改变？当面对这些具有强烈侵略性和创伤性的事件时，我们真的有可能做到抱有尊重与关怀，而非哗众取宠的好奇心吗？当你阅读这本书时，又会发生些什么呢？

[*]济慈于1817年在信中提到并定义了这个概念：“Negative capability, 即一个人能够在不安、迷惘、困惑中生存，而不是烦躁地务求事实和原因”。见Rollins, H. E. (ed.). 1958. *The Letters of John Keats 1814—1821 (Two Volumes)*, Volume I. [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 191.——编者注

[†]“并置”是把极不协调的题材放在一起以形成对比或表明其新关系的艺术手法，也是本书采取的书写风格。（本书脚注如未特别标示皆为译者注）

[‡]严格来说，the divine是比“神”抽象的概念，人格化的味道要稀薄得多。

[§]作者加上“基督教版”几个字以资区别，因为这里的“恶的悖论”和前文提到的“邪恶的悖论”原文都是the paradox of evil。“恶的悖论”的“恶”字同时兼指各种罪恶和人间疾苦。

恶人

你怀念你的老战友吗——那些跟你一起直到战争结束的人？

啊，会，我怀念他们。他们大部分人，你知道的，就像兄弟一样。真的。他们真的就像是你的家人。

我可以想象……

对，我们一起出生入死。你知道吗？我们一起经历过的事情比亲兄弟还多。对，我怀念他们。当然怀念。

*

每一次，我都会递给受访者一小包产自明尼苏达州的天然稻米。每一次，我都以笨拙地不停半鞠躬开场，拿同样的事情开玩笑：我连“很高兴见到你”乃至“谢谢”之类的简单日语都说不好。他们听后会面露微笑，我能看出他们为自己在微笑而感到惊讶，我想每次都从自暴自弃开始是件好事。

早上，我和摄影师会到旅馆外面喝咖啡和吃糕点。晚上，翻译会带我们出去找乐子：看歌舞伎，看武术表演，吃最美味的平价寿司，去她最喜欢的老酒馆喝两杯。我们三个人天南地北无所不谈——唯独不谈那些我们采访过的人。

*

为什么我会干得出那样的事？连我自己都不明白……我只是个农家子弟——一个在农民家庭长大的人。这是我后来会思考的问题。你知道，到头来你的感受就是这样的。唉，我不是个会干出那种事的人。

*

直到今晚为止我没有看过一场职业格斗。日本有些武术表演很文雅，像是液体舞，但今晚的表演却是货真价实的打斗。其中一方眼看就要胜出。他把另一个男人压在草席上，用拳头狠狠揍对方的头，一下又一下。每发出一声闷响，观众就会集体发出呻吟。那一定会疼，非常疼，但挨揍的那个男人脸上看不见任何表情。那个揍他的男人脸上的表情倒是非常丰富，五官扭在一起，像是愤怒或害怕，但我分辨不出是哪个。

我一直在跟摄影师和翻译交谈，在那里待了很久，久到离开的时候和两位正要回家的格斗者同乘一台电梯。这时我才看出来他们都还算不上男人，只是大男孩而已。我惊讶地发现自己其实比他们要高。事实上，站在他们身边，看见他们待在一起有说有笑，那种感受近乎震撼。从这个距离，我可以看见刚才的输家脸颊上的破皮：想必是被草席擦伤的。基于一些原因，这让我对他生起了慈爱之心。我很想侧身靠近他，问他：你是怎样恢复原状的——在经历方才的事后——回到这副正常的样子的？

*

“你们这些小王八蛋！混账东西！”——我们会骂这一类的话。但我们没有整垮他们。我们是在试着让他们振奋起来。因为如果发生了什么事——如果我们搞砸了——他们一上战场就会死掉。我们得推他们一把，逼他们快速行动起来。所以我们就呵斥他们。他们接受训练就是为了能采取正确的行动，不是吗？如果他们能变成那样，就能避开朝他们射过来的子弹。这就是我们那样做的原因。

*

我对每晚一起出门消遣感到不自在。这一切令人觉得如此不协调。我一会儿是神社里的游客，一会儿让一个离死不远的老人告诉我他是怎样学会用酷刑折磨人的，一会儿跟一个得过奖的摄影师边喝酒边探讨美学。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让这些事挨在一起。就好像有人拿着一根铁棒撬开了日常生活的缝隙，而那些

被我们遮挡、掩盖住的恶魔突然出现在那里，不依不饶地待在我们身边，待在所有事情的旁边。

事实上，“在旁边”（next to）就是我对我们三个一起度过的时光的看法，那些白天和夜晚。它们都是一些“在旁边”的时刻：发生在访谈的“旁边”。这让它们听起来毫无分量，我起初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渐渐改变了看法。“在旁边”的存在至关重要，不管那是什么东西。

我不停地思考在某件事的“旁边”意味着什么，而“拼合在一起”（fits together）又意味着什么。有一天，在开车上班时，我的车子在积雪上打滑，差点撞死别人。最后什么都没有发生，只是很吓人罢了。但在这之后立刻去上班实在是件奇怪的事。

似乎我总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毫无空隙，现在依然如此。

*

那些做不到的人会感到羞愧吗？

没有“做不到”这回事……我们会逼他们干，逼他们捅刀子。

*

就着明尼苏达州冬天一杯热腾腾的咖啡，朋友安妮问我：他们为什么没自杀呢？她是一名勇敢而坚定的女性，同时也是一名惯于提出难题的内科医生。她把红铜色的头发从眼前拨开，定睛望着我。你为什么不问他们这个问题？

我不曾有过跟加害者打交道的经验。和这些人待在一起，有时我会觉得自己正在参加一场带导游的地狱旅行团。亲密感和眩晕感同时涌现，觉得自己被指引方向的同时又感到迷失。所以我采取了大部分教授用来处理新事物的方法：试着通过把这一切学术化来控制它。我从很多领域寻求帮助。而我获得的大部分帮助来自艺术与人文学科的传统。伟大的文学作品都是怎样理解历史上的大屠杀的？不同的宗教和哲学传统是怎样处理凶残这个问题的？是怎样把这个世界持续不断的残暴行为同对更高目标、人类存在的意义及“神”的信念调和起来的？社科领域中的一些重要构想也给了我很多帮助。种族清洗的普遍政治与文化特征是什么？把人变成怪物需要哪些组织上与心理上的流程？要怎样才能有可能彻底转变这些流程？

这些都是重要的问题，而我即将和各位分享我找到的答案。但是，如果有一个问题居于本书的核心位置，那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告诉你们这些故事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而听我讲述这些对你们来说又意味着什么？这仍然是最让我困扰的问题。正是这个问题决定了本书的展开方式，决定了记述的事情如何发生在彼此的“旁边”。随着我们一同推进下去，我会多次用不同的方式提出并回答这个问题。

接下来是第一个故事。

*

阪仓君

突然间，从村子里冲出一群十五六岁的人。当时我甚至都没见过八路军，不知道敌人长什么样子。我不知道眼前这批人是什么人，所以马上趴下。因为有更多的人冲了出来。然后我听到指挥官下令：“开火！”他说，“统统打死！”然后我……我也开了火。我射出的子弹打中了人。“真的击中了。”我想。而大多数人，他们就像苍蝇一样纷纷倒下，你明白吗？

等他们都倒下之后，然后……那里有一片高粱地，当时正好是六月中旬，所以那片地看来非常大。（他用手比画）所有人都倒在里面，或是跑了进去。我追在他们后面。然后在高粱地里面，我去的那块有一个倒在地上的人。我看了看，是个农妇。她已经倒在地上死了。我心：“好吧，是个农妇。我对此什么都做不了。”我准备继续往前走，然后发现就在那女人的手臂下面，有一个小婴儿，懂吗。一个小婴儿

把头探了出来。然后它的手——（沉默）正在摸那个女人的乳房，明白吗，在找乳房，用手碰乳房，明白吗？然后它抬起头看着我，向我微笑。我太震惊了。然后我发现自己不能走路了，你知道吗？然后，唔，我感到的不仅是害怕，而是……我感到一阵寒意从脊椎升起。然后我想往前走，却走不动。一些老兵从我身后跑进来；敌人正在追击我们——“快跑！”他们说。然后我便跑了起来。我们跑掉了，就这样，这之后我想到它，那个婴儿，周围一个人都没有，会就那样死掉，我想。而这是最……在这场战争中……我的行为，第一次……第一次对我来说有点，类似让人反胃的感觉——那种感觉真的击中了我，你知道吗？这就是发生过的事之一。

*

上述是阪仓君故事的中段。当一切开始时他还是个平民，等到一切结束时他已是加害者。

阪仓君向我讲起那个婴儿时，已经离死不远了，他正试着理清自己的人生。他在战俘营待了很多年——又经历了更多年的社会放逐——期间不断审视他做过的事以及这些事对他的影响。他犯下凶残的暴行，造成了无法估算的痛苦，但他也经历了精神上的创伤。事实上，犯下的罪行成了他的创伤。他感到死亡正在靠近，他说，如同某种“压力”一般。“我已经没有未来了……如果我不抓紧时间，趁现在说出来——如果我死了，就没人来讲这些事了。”

阪仓君和其他我访谈过的老兵组成了一个独特的团体。他们都是“中国归还者联络会”（Chukiren）的成员，这群反战的退伍军人已经为之工作了四十五年，旨在引发人们对日本战争罪行的关注和促进中日两国的友谊。他们代表一群日本军人，大约有一千一百人，这些人曾经在战后被苏联俘虏，若干年后被引渡到中国的抚顺监狱。西伯利亚的战俘营以非人般的残忍对待他们。但抚顺监狱却令人迷惑地用几乎完全相反的方式对待他们。那里的工作人员被告知要待这些犯人如客人：尊重他们，让他们吃饱饭，满足他们的医疗需求，为他们组织体育和文化活动。这些战犯也接受了思想改造：经过一段时间后，他们经历了一种如同转变宗教信仰般的体验。他们批判自己过去的价值观——事实上还批判过去的自我——并承诺把自己的生命献给反战主义的布道。这批日本老兵把他们的转化形容为“抚顺奇迹”。1956年，中国终于为这些人召开了特别军事法庭，起诉了其中的四十五个人，这些人最终全部获释。

1957年1月，这批“中国归还者”建立了一个正式组织，决计要相互扶持，致力打破日本对战争罪行的沉默。虽然大多数时候受到大众和主流媒体的轻蔑或冷落，但他们仍然继续活动，直到2002年，因大部分成员年迈多病而难以为继。不久后，新一代活动人士在埼玉县建立了“归还者和平纪念馆”。馆里收藏了超过二万本图书，以及相关的录像带及照片，里面挤满了书架和研讨桌，比起纪念馆，更像是资源中心和图书馆。就是在这里，我们被第一次介绍给那些老兵。

从一开始，我便觉得这些人视自己为历史的产物。他们欣然接受人们的指责，但又把这当作是超出自己控制的历史语境的一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一跃成为亚洲的军事霸权。这个越发军事化的国家由神圣的天皇统治，汲汲于展示实力和抵抗西方帝国主义的壓力。但要确保区域性霸权，日本还需要掌控中国的资源。结果就是一场灾难性的竞赛：“中国的重新统一与日本在中国的扩张”的竞赛。^[1]1931年，日本入侵东北，成立傀儡政权伪“满洲国”。中日战争在六年后全面爆发，导火线是发生在卢沟桥的一场军事冲突。日本把后续的冲突和所有因此犯下的战争罪行说成攸关民族荣耀和使命。一份于1943年撰写的日本政府报告把日本的领土野心粉饰为一种准人道主义的介入：“我们大和民族，正挥洒着‘血’以达成我们在世界历史中的使命：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为实现亚洲十亿人民的解放，更为了永远保持我们在大东亚共荣圈的领导地位，我们必须把大和民族的‘血’植入到这些‘土壤’中去。”^[2]

宗教上的正当理由响应了帝国的正当理由。甚至连禅宗学者都参与进来，在报刊上发表论证：中国已经成了一个不明佛理因此亟待拯救的国家，透过日本高一等的精神了悟，中国的“不合理性将会获得纠正”。“透过一场慈悲的战争，交战的国家可以提升自己，而战争可以消灭战争本身。”^[3]

这是那些“中国归还者”想向我这个美国人强调的历史背景，我们交谈时，一支美国的军队正在占领伊拉克。凡事总有它发生的背景。

*

欢迎访问：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https://www.shgis.com>)
文档名称：《恶人：普通人为何变成恶魔》詹姆斯·道斯.epub
请登录 <https://shgis.com/post/3603.html> 下载完整文档。
手机端请扫码查看：

